



● 作者/B.A. Friedman ● 譯者/王建基 ● 審者/丁勇仁

美陸戰隊偵打戰術與機動作戰：

美陸戰隊3.0

Reconnaissance-Strike Tactics and Maneuver Warfare II: Marine Corps 3.0

取材/2022年5月美國陸戰隊月報(*Marine Corps Gazette*, May/2022)

本文探討美陸戰隊歷史，解釋美陸戰隊1.0、2.0及3.0之編組原則，並說明陸戰隊如何因應資訊時代，摒棄陳舊缺點、保留原有優勢及創造新作戰概念，方能發揮最大功效，協助聯合部隊作戰。

(Source: USMC/Alexis B. Betances)





在新興戰術與科技問世之際，美陸戰隊已有完善的適應紀錄。(Source: USMC)

人們最無法理解美陸戰隊作戰哲學的面向，或許就是非線性戰爭。在《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中，有一章節專門闡述此一想法，其中指出該想法就是戰爭不確定性的來源。這點無庸置疑，但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複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相互競爭時，這也是戰爭複雜性(就科學角度而言)的特點。在《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頒布

數年後，科學家對於複雜性已多有認知。事實上，我們現在能理解，所有軍隊都是複雜適應系統，而且複雜與混沌的諸多特點，對戰爭都是一體適用。

例如，美空軍墨菲(Eric Michael Murphy)上校就曾透過複雜適應系統的角度檢視兵力設計，並指出軍隊所展現的七個複雜性特點。其中包括多元性(Diversity)、互賴性(Interdependency)、適應性(Adaptation)、

非線性(Nonlinearity)、突破性(Emergence)、共同演化性(Co-evolution)及路徑依賴性(Path Dependence)。¹ 各作戰組織全都展現出這種特性。雖然墨菲將其分析結果運用於空軍，但其結論同樣也適用於美陸戰隊。

由人類主體所構成的複雜適應系統，有時也稱為複雜適應社會系統(Complex Adaptive Social System)。所有作戰組織，

無論是美陸軍、美海軍或叛亂團體，皆是複雜適應社會系統。複雜性科學(Complexity Science)說明，當新的行為——戰術——出現時，組織的主體會進行適應，創造出各種新形式的組織，使新行動順遂執行。改變與連續性會同時存在：組織的某些特點仍然適用，而其他特點則會被取代。任何一種兵力設計作為，無論是否慎重為之，都是將此適應性運用於作戰環境及後續出現的新行為。

透過這個角度，在檢視美陸戰隊歷史後，便能掌握其未來。陸戰隊是複雜適應社會系統，在新戰術出現前，便已歷經此種適應過程。檢視歷史，能讓我們理解陸戰隊應如何演變及適應新問世的偵察打擊戰術。

初期的美陸戰隊

在筆者的學士後課程研究中，重點置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陸戰隊兩棲作戰，並發現陸戰隊組織區分兩個階段，稱之為陸戰隊1.0及陸戰隊2.0。

美陸戰隊1.0的原型，是參照18世紀英國皇家陸戰隊(Royal Marine Corps)所編成。陸戰隊

1.0是帆船時代為滿足前工業時代的海軍作戰所設計。由各艦分遣隊組成，成員是與美海軍共同在海上與岸際灘頭作戰的專業陸戰隊員(而不是充員兵或兼職民兵)。因此陸戰隊是由多個分散各處、模組化、自給自足，而且能個別/集體運用在大規模作戰的單位所組成。這是一支專門根據其兩棲載臺所建構的陸戰隊：帆船。當然，陸戰隊在這段期間也並非停滯不前。戰術與概念雖然演進緩慢，但在帆船時代，陸戰隊仍是以各艦的分遣隊為組織基礎。

自工業革命後，新科技快速催生各種新戰術。在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工業戰爭的洗禮後，美陸戰隊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了長期的現代化過程。改革概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的加利波利登陸戰失利前就已產生。激發此次改革的源頭，包括艾里斯(Pete Ellis)中校的諸多著作。艾里斯早在1912年就已出版有關現代化兩棲作戰，以及加利波利戰役與阿爾比恩作戰的經驗與教訓(Operation ALBION：1917年德國成功擊敗俄國的一次兩棲作

戰)等著述。² 許多的經驗教訓與相關應用，都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滲透戰術的基礎。這些改革都是在勒瓊(John Lejeune)擔任陸戰隊司令期間所展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陸戰隊已因應工業化完成變革：為有效運用兵力與火力對抗陸岸目標而建軍。顯而易見的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陸戰隊所發展的概念與戰術對其作用極大，也對採用相關概念與戰術所發展之美陸軍準則與裝備有不少助益——甚至隨著戰爭推進，這兩個軍種也必須適應不斷改變戰術的日本與納粹德國。雖然美陸軍於1960年代不再注重兩棲能力，但美陸戰隊直到為了適應工業時代的兩棲作戰及其兩棲載具：兩棲戰艦，才著手進行改變。

透過此一轉變，在新的適應作為出現時，新的組織也隨之產生，以儘可能地有效且快速落實相關新的適應作為。戰術會不斷演變，但是階段性的變革是因需要而產生，此樣態稱之為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這並不表示原有組織



及其所屬單位全然無用。原有組織若仍具有其特點，則可保留。這就是美陸戰隊1.0與陸戰隊2.0為何同時存在。雖然艦船分遣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存在許久，但艦船分遣隊模組化的本質，還是使美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系統下之陸戰隊遠征支隊(MEU)、陸戰隊遠征旅(MEB)、陸戰隊遠征軍(MEF)及特種用途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Special Purpose MAGTF)，採用了新的形態(儘管是較複雜的形態)。

最後，從美陸戰隊1.0蛻變至陸戰隊2.0的過程，展現出概念才是新形態組織的先驅。陸戰隊2.0是參照艾里斯於1912至1913年間開始發展的概念，並於1918年陸戰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編成。勒瓊出任陸戰隊司令後，開始著手落實此一概念，並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美陸戰隊3.0

如果美陸戰隊歷史區分為前工業時代的陸戰隊1.0及工業時代的陸戰隊2.0，那麼現在就剛好是改變為資訊時代陸戰隊3.0的時候。陸戰隊3.0的創新概念，就在《艦隊陸戰隊教範手冊-1：作戰》(FMFM 1, Warfighting)中，其蘊含之概念遠超過其年代。此概念與艾里斯所提出的諸多觀念相似，且相關概念在數十年後才付諸實行。若當時可提供兵力設計做為參考的是滲透戰術，那新興的偵察打擊戰術則可提供現在的兵力設計做為參考。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在內勒(Robert B. Neller)上將與柏格(David H. Berger)上將擔任美陸戰隊司令期間，相關工作便已付諸執行。2016年，內

勒所核定的《陸戰隊作戰概念》(Marine Corps Operating Concept)，發現此問題：陸戰隊的編組並不適用於執行資訊年代戰場的機動作戰。柏格曾推動諸多必要改革措施。這兩者間之延續性，在《2018年司令計畫方針》(2018 Commandant's Planning Guidance)的第一頁中有明確說明。

《2018年司令計畫方針》與當年勒瓊開始落實的概念類似。

在柏格的改革中，改變與延續併進，而勒瓊的作為亦相同。例如，分散式作戰(Distributed Operations)一向是美陸戰隊作戰的特點，甚至在陸戰隊1.0期間更是如此。陸戰隊濱海團(Marine Littoral Regiment)就是陸戰隊2.0陸戰隊防禦營(Marine Defense Battalion)的更新版。舊有的部隊組織若有用就予以保留，即便其任務改變亦復如是。

回顧此專題第一篇文章內以資訊為主的偵察打擊複合體及偵察打擊戰術等相關討論，陸戰隊3.0具有強化陸戰隊潛力，以提供聯合部隊一個前進部署、適應性強及海上偵察打擊的複合體。陸戰隊3.0或許無法直接擊敗敵軍，但可以奠定後續部隊成功的基礎，也可在敵後續部隊抵達前予以削弱及擾亂。當其他聯合部隊與陸戰隊的增援部隊到達時，以具備高品質、可資行動的敵方資訊，且敵軍業已遭受陸戰隊介入部隊之先期打擊。此外，此一任務也完全符合聯合作戰範疇下兩棲作戰之定義。快速機動的介入部隊可執行兩棲攻擊，並視時機在適當的時間點與地點開設遠征前進基地，並同時運用偵察打擊戰術。此後，介入部隊能在其餘聯合部隊到達後，轉用於其他行

動的兩棲支援任務。³

轉型至陸戰隊 3.0 需要時間，而美陸戰隊可能還在初始階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登陸作戰暫行準則》(*Tentative Manual for Landing Operations*)，於1934年第一次出版。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著手確認新的事物、老舊卻仍適用的事物，以及時至今日陸戰隊還缺少的事物。

如上所述，美陸戰隊遠征軍資訊大隊(MEF Information Group)是新編成單位，而且可能是最具遠見且最重要的改革。遠征前進基地作戰(*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與介入部隊兩者都是新的概念，即便是從脫胎自分散作戰與前進基地作戰等舊概念發展而來，這兩個概念在海洋控制(Sea Control)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構思出的、任務也雷同的陸戰隊防禦營，更為積極、採取更迅速之攻擊姿態。以可蒐尋目標、標定目標及形塑戰場的陸戰隊遠征軍資訊大隊；可執行快速反應計畫作為程序，配合作戰節奏的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指揮組(MAGTF CE)；

可使用精準導引彈藥打擊敵軍且受機動部隊管制的地面作戰部隊(Ground Combat Element, GCE)與空中作戰部隊(Air Combat Element, ACE)；以及可在作戰全期提供維保的後勤戰鬥部隊(Logistics Combat Element, LCE)為基礎，將可打造一支以陸戰隊為首的偵察打擊兵力。

至於什麼事物是老舊的？美陸戰隊員仍然是陸戰隊的不對稱優勢。具模組化、有高度彈性的陸戰隊陸空特遣部隊系統，能夠(也應該)繼續協助陸戰隊遠征支隊危機應處，以及協同陸戰隊濱海團、陸戰隊遠征旅及陸戰隊遠征軍(擴增兵力)實施海上偵察打擊戰術。當然，當聯合部隊轉型成為全領域與多領域作戰之際，陸戰隊固有的多領域本質，仍將如同過去一個多世紀一樣，為聯合部隊提供最佳服務。

部分原有的單位也會有新角色。偵察單位將肩負起多重角色，將實體偵察結合整合電子與信號偵察。海空火力連絡連將會特別重要，因為前進作戰將來要與友軍共同作戰，也需要極為複雜的聯合與建制精

準導引彈藥的火力支援協調作業。尤其是砲兵等其他單位，將會有新的挑戰，因為砲兵具有較複雜的操作程序及遠距載臺。

就遺漏的部分而言，當前改革未能置重點於安全合作與非正規作戰。除非與盟國及夥伴國共同合作，否則前進作戰根本無從執行，而盟國關係的建立，就是對手國望塵莫及的美國優勢。敵人的做法不是結盟，而是會透過運用非正規作戰，設法將行動限制在公然衝突的門檻下。美陸戰隊應運用其一個多世紀以來在非正規作戰方面的強處，以及近期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各項經驗，來制定新的《小型戰爭手冊》(*Small Wars Manual*)。《小型戰爭手冊》旨在闡述如何在低強度戰略競爭中與夥伴國共同合作，該準則將藉陸戰隊特種作戰指揮部(Marine Forc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海空火力連絡連、陸戰隊顧問連(Marine Corps Advisor Company)及民事大隊(Civil Affair Group)等單位重新檢視內容，然後再與《陸戰隊教則出版品-1》結



合作為基礎哲學。正如2022年2月，葛拉漢(Chris Graham)中校於《陸戰隊月報》所述，所有戰爭都包括非正規作戰不同階段(事實上一向如此)。⁴

對於非正規衝突，美陸戰隊在擔任顧問與合作夥伴的角色上具有長久歷史。放眼未來，陸戰隊應置重點於後者。陸戰隊並未有其所需的員額(End Strength)，可如美陸軍安全部隊合作旅(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 Brigade)般提供大量的全職顧問。陸戰隊不應只是擔任顧問，而應置重點於擔任最佳共同作戰部隊：在統一的指揮鏈下，與各單位相整合。藉由與各單位共同作戰，而非提供個別建議，共同作戰的部隊應與陸戰隊空陸特遣部隊相整合且受其管制。各單位連絡官與連

絡組參謀，編組派遣至空海火力連絡連與陸戰隊顧問連等模組化單位，使共同作戰部隊具隨插即用(Plug and Play)的功能，進而與陸戰隊各個階層協同作戰。如此一來，必將創造出另一個陸戰隊能力，此能力雖然與聯合部隊截然不同，但源自於陸戰隊的歷史、傳統及優勢。

最後，美陸戰隊與美海軍或與美太空軍的整合同等重要。如果陸戰隊介入部隊能與太空軍最新的情監偵能力，以及美空軍強大的火力相互整合，其戰力必能大幅提升。所以使陸戰隊與太空軍及海軍相整合同等重要。這是個尚未開發且使軍種互蒙其利的關係。陸戰隊介入部隊的地面感測器、偵察作為、終端攻擊導引，以及前進部署與



陸戰隊官兵發射RQ-20美洲獅(Puma)小型無人飛行系統(sUAS)之情形。(Source: Lance)

加油可為空軍提供數據，且空軍同時可自其感測器網格、前進指管、確保制空，以及額外火力提供數據。此外，與遠征前進基地作戰概念以及空軍彈性戰鬥部署(Air Force Agile Combat Employment)有關之後勤挑戰十分相似，因此能夠同時找出兩者的解決方案。各軍種能透過將空軍戰術空中管制組(Air Force Tactical Air Control Party)人員重新編入海空火力連絡連的做法建立協同性。海空火力連絡連的沿革，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聯合突擊勤務連(Joint Assault Service Company)，該連的任務是將陸戰隊、海軍與陸軍航空兵連絡人相整合，協調聯合兵種支援相關事宜。

結論

在第一篇文章中，以理論探討21世紀作戰軍種如何編組實施機動。同時也提到，舊有的模式——閃擊戰——是個迷思。但當時的德國陸軍有一件事可供學習。德國陸軍在戰術上的成功，並非是開創性運用戰車或摩托化作戰之結果；也不是開創性運用空中密接支援；更不是發明無線電通信的結果。其成功的原因在於，以裝甲師與滲透戰

術為基礎，以統一運用前述戰術為目標而重新調整組織。重點不是發明新能力；而是編成的組織可運用最新戰術概念。在21世紀初期，關鍵就是參照偵察打擊戰術來編成部隊。

第二篇文章是關於美陸戰隊過去如何根據最新戰術概念進行組織重整且獲致成功，以及為何現在正值組織重整的時機。陸戰隊1.0是根據19世紀的戰線戰術所設計。陸戰隊2.0是根據20世紀的裝甲兵滲透戰術所設計。陸戰隊3.0的組織，無論是透過《兵力設計2030》或者其他指導文件，都必須根據能聯合運用全面情監偵、無人載臺及精準打擊武器系統的21世紀偵察打擊戰術進行設計。當陸戰隊需要在某個年代執行其任務時，複雜理論就能對陸戰隊如何根據新興戰術規則實施組織重整，提供一個解釋架構。

但敵人也是考量因素之一。在第三篇文章中，將繼續檢視另一個版本的資訊時代作戰組織：共軍。

版權聲明

Reprint from *Marine Corps Gazette*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Erick Murphy,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ce Structur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Montgomery, AL: Air University Press).
2. 請參見B.A. Friedman, *21st Century Ellis: Operational Art and Strategic Prophec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5); Angus Murray, "The U.S. Marine Corps and Gallipoli," in T.G. Heck and B.A. Friedman eds. *On Contested Shores: The Evolving Role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arfare*, (Quantico, VA: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d Bruce

Gudmonsson, "Ambiguous Application: The Study of Amphibious Warfare at the Marine Corps Schools, 1920-1933," in Heck, T.G. and B.A. Friedman eds. *On Contested Shores: The Evolving Role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arfare*, (Quantico, VA: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Press, 2020).

3. 關於準則上之定義，請參見Offic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P-02, *Amphibious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19).
4. Chris Graham, "Readiness for the Irregular Future," *Marine Corps Gazette*, (Quantico, VA: February 2022).